

中国游侠史

汪涌豪 著

复旦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游侠史/汪涌豪著. —上海:复旦大学出版社,
2001.8
ISBN 7-309-02877-5

I. 中… II. 汪… III. 侠客-历史-中国
IV. D663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32123 号

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

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200433

86-21-65118853(发行部) 86-21-65642892(编辑部)

fupnet@fudanpress.com <http://www.fudanpress.com>

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

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

开本 850×1168 1/32

印张 12 插页 2

字数 315 千

版次 2001 年 8 月第一版 2001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 20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。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序 一

王运熙

游侠是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部分特殊人群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，曾经对政治、社会产生不同的作用。影响所及，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不少以侠客为题材的作品，唐传奇中的一些篇章，清代的一些侠义小说，是其显著的例子。因此，对古代游侠进行比较系统全面的考察，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一个重要课题，同时也能增进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。

战国、西汉时期，游侠盛行。战国时孟尝君、平原君、信陵君、春申君等四大贵公子，仗义疏财，具有豪侠之风。他们手下各有许多门徒食客，其中有不少游侠之士。西汉游侠继续兴盛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均设《游侠列传》记载其事迹。此后，由于帝王的禁止、镇压，游侠稍衰，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以后的各朝正史中，也不再设立游侠传。但事实上，西汉后的各个朝代，游侠仍然继续不断地涌现，只是发展呈波浪形，有时兴盛勃发，有时低落岑寂。一般说来，当中央专制政府统治力量强大时，游侠往往受到压抑；反之，当中央统治比较薄弱，特别是群

雄纷争、社会动荡之际，游侠就容易得到广阔的活动天地，蔚然成风。由于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以后各朝正史中再无游侠专传，有关这一人群的情况，仅散见于史乘、笔记，缺乏系统的记载，因而人们对西汉以后他们的活动情况，往往知之甚少；倒是对文学作品中的一些侠义题材，比较熟悉。“五四”以来，也有少数学者，从社会史角度注意到游侠，但尚缺乏详细论述之作。汪君此书，可说是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游侠史专著，这是十分令人欣喜的。

本书的特点和优点，我觉得主要有二。其一是论述相当系统全面。全书共分八章，第一、二两章为上半部，在分析了游侠的性质特征之后，着重从纵向方向，系统叙述了先秦、两汉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五代、宋元明清、晚清各个历史时期的游侠情状，发掘、提供了许多文献资料。第三章以下为下半部，着重从横向方面，分别论析了游侠的社会关系、活动方式、人格特征、衰落原因等等，并把游侠和外国的骑士、武士作了比较分析。前后八章，纵向和横向的叙述、分析相结合，使读者对游侠的历史发展、特征、历史背景等获得了比较系统全面的认识。其二是分析相当细致深入。作者不但勤于发掘、搜集有关原始资料，使全书材料详赡，而且善于吸取前人包括近现代学者的有关研究

成果,囊括群言,通过冷静的思考分析,作出自己的判断。如第一章中对游侠和刺客的异同,和儒墨两家理想的异同,第六章中对游侠衰落原因的分析,都相当细致,并且有说服力。第三、四、五章,分析游侠的各种社会关系、活动方式、人格特征,尤使人有条分缕析,眉目分明之感。我不敢说这本游侠史已经写得十分完美,无可指摘,但作为一部草创性的专著,能够做到这样,应当说是颇为难能可贵的了。

汪君年轻好学,前数年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攻读“中国文学批评史”专业博士生,已获博士学位。他潜心于中国古代文论研究,著有《风骨论》一书,即将问世。还爱读历史,重视搜集、考查原始资料。为了写这本书,翻阅了《二十四史》中的许多有关篇章和大量其他文献资料。他又重视学习理论,注意吸收借鉴国外的新理论、新方法。写作论文,能注意以史实为依据,以理论为工具,从大量史料中概括出观点来。这样做,是比较严肃和科学的。在这本专著出版之后,希望他继续前进,继续提高,在中国文史研究领域作出更大的贡献。

1993年10月

序 二

骆玉明

侠之为义多歧，而任侠之徒，亦行止不一，取舍互违。以太史公《游侠列传》所言，即有卿相之侠，布衣之侠，匹夫之侠，闾巷之侠，乡曲之侠，暴豪之侠；曰文曰武，有贵有贱；或藉势呼众，或修行砥名，乃至欺凌孤弱，恣欲自快者，亦得厕于其间。至若后世被侠之名者，其纭纭纷纷也，更仆难数。侠岂易言哉！

虽然，侠之为侠，固有其大端可论焉。其一，侠可谓国家体制外之力量，其行无视乎法规，不囿于正统道德，聚则自立门规，自成一体，散则独往独来，仗剑横行，韩非云“以武犯禁”、史迁谓“不规乎正义”是也。其二，侠之立世存身，大抵重快意而尚豪迈，不欲琐琐鄙鄙，曲意顺人。其重然诺，轻货财，拔人于厄难，曾不虑生死，则尤为世所称羨者。以中国旧时情形论之，法律常粗疏而官吏多贪暴，民间群体遂不能不自行组织，相为维护。而人谁无缓急，当困厄之际，官府莫能解，亲戚不能济，则有望于友朋，有望于陌路中持力行义之人，亦自然之情。侠每称为“游侠”，侠所游谓之“江

湖”，明喻别有一番天地在国家体制之外焉。至若礼法多拘，令生趣销磨，人情委顿，激昂多情之士逸出罗网，顾影婆娑，又别具美态。李太白无论矣，若龚定盦辈，虽饱学深思，经史充怀，情之所属，独在剑气箫心，良有以也。故侠虽初非美名，而渐成佳称，久著于人心，固与中国社会之特征有绝大关联。而但为悍顽、侵袭孤弱之徒，虽亦以侠自命，奈人意不与焉。

今之人于侠有所知，大率由金庸辈武侠小说得之。问及其他，视天茫然。以游戏视武侠小说，诚无可厚非。然欲稍进一步，得知此类小说缘何生于中国且历古今而不衰，则必待有所闻于历史中侠之情形。至若探究中国社会史、中国文化之特征，则游侠史尤为不可或缺之层面。唯正史所纪，自史迁首序游侠，班书因之，而后无继踵。自兹散载于群籍者，纷繁杂乱，褒贬任意，莫或董理，而侠之迹相，或隐或显，寻绎为难。近世学人于此有所注意，亦多在一节。于是有汪涌豪氏《中国游侠史》出。

汪书二十余万字，非所谓煌煌大著。然其所披览，自十三经、二十四史迄近世说部，并西洋与日本史亦略有所取。于中剔抉爬梳，广征博引，多方比照，缕分条贯，用力甚勤。较之泛泛为言而连篇累牍者，反见厚重。其书纵则溯原始、析名义、辨分歧、述流变，描绘游侠共时代

风习相为迁化之情形；横则由游侠之服饰佩戴、谋生方式，进而综论其人格精神，更比较以西洋骑士、东瀛武士，显示其种种生存样态。虽游侠为极不稳定之人群，“游侠”之名，义界亦多含混，欲编列成史，殊非易事，然此一人群之向来面目，其影响于中国社会生活之概况，已大略可见。有意探究中国历史文化之人，观是书可别得一蹊径焉；而借古观今，当亦多有会意。

汪君昔年初入复旦求学，予尝讲授中国古文学于其所在之班级，课余则无所不谈，知其聪明，亦知其心意慷慨而出以温良。属意游侠，其中或有寄托乎？近年汪君著述渐丰，有识者言之啧啧；予则将老未老，早显昏蒙，望其项背渐远。今汪君嘱为《中国游侠史》作序，虽不足以荣其书，可志旧谊，遂书此数纸云尔。

2001年4月

目 录

| | |
|---|-----|
| 绪言 | 1 |
| 历史上的三游与士的失职——文士与武士的 转换——好文者为游士与尚武者为游侠—— 对游侠殆历五百年的质疑 | |
| 第一章 游侠：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 | 14 |
| 释名与异称——类型区划——集团构成—— 与刺客的契合和分际——与儒墨理想的同 异——所谓任侠 | |
| 第二章 游侠的发展历史 | 54 |
| 在风雨颂洞中崛起：先秦游侠的勃兴——置身 于社会生活的漩涡：两汉游侠的奋盛——衰世 放狂：魏晋南北朝游侠的发展——治乱相替与 任侠成风：隋唐五代游侠的风行——专制统治 下的岑寂：宋元明清游侠的消歇——历史大变 局中的回响：晚清游侠的流风余韵 | |
| 第三章 游侠的社会关系 | 172 |
| 与公侯权贵相馈赠——在豪宗强右的庇荫下—— 强藩的招募与重用——义结盗匪与躬自为盗—— 融入农民起义的潮流——会党斗争的中坚 | |
| 第四章 游侠的活动方式 | 219 |
| 意在炫耀的服饰佩戴——悖去常道的资财 获取——走马纵犬与少年之戏——不尽合法 的任侠义举 | |

| | |
|--|-----|
| 第五章 游侠的人格特征 | 260 |
| 慕义感分临难不苟的忠勇——重气轻死不 爱其躯的疏放——修行砥名有以树立的自 励——任张声势擅作威福的骄蛮 | |
| 第六章 游侠衰落根由的究诘 | 292 |
| 恒定社会设计与游侠的社会存在——传统 道德规范与游侠的价值取向 | |
| 第七章 骑士·武士·游侠 | 317 |
| 骑士风度与游侠气派(比较之一)——武士 精神与游侠崇尚(比较之二) | |
| 第八章 游侠的存在意义及评价 | 340 |
| 乱世重侠游:纷乱时事中的公道和良心—— 纵死侠骨香:足以振拨人心的崇高精神 | |
| 后记 | 365 |
| 再版后记 | 368 |
| 三版后记 | 371 |
| 主要参考书目 | 373 |

绪 言

公元二世纪，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荀悦，本着“放百家之纷乱”、“一圣人之至道”的救世热忱，写了一部叫做《汉纪》的书。在书中，他对周秦以来的贪秽之俗作了强烈的抨击。而被他指为末世贪秽的习俗当中，就有我们关注的对象，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无数壮烈之举的游侠。他是这么说的：

世有三游，德之贼也。一曰游侠，二曰游说，三曰游行。立气势，作威福，结私交，以立强于世者，谓之游侠。饰辨辞，设诈谋，驰逐于天下，以要时势者，谓之游说。色取仁，以合时好，连党类，立虚誉，以为权利者，谓之游行。此三游者，乱之所繇生也。伤道害德，败法惑世，夫先王之所慎也。

显然，在他看来，游侠、游说和游行三者，都是大违道德礼义，不拘成法，乃或对先王先圣确立的礼治社会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。他们不遵礼义纲纪和等级制度，去应奉之职守，当务之正业，

而追求自己的声名，偏逞个人的私臆，实在是妨碍王化的罪魁祸首。并且，文中将游侠列在“三游”之首，似可看出他对这一种人的不满，是异常强烈的。



春秋许国持节符使者像
东晋顾恺之《列女图卷》局部

为了便于了解游侠活动的历史背景，我们不妨先从游说、游行的崛起说起。游说，顾名思义，是指靠说辞耸动人主，以求进用之人，所谓“谈说之士资在于口”^①。这类人物，正如作者在同一段文中所说，“本生于使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出境有可以安社稷，利国家”。春秋之时，各诸侯

国交往频繁，国与国之间有诸如攻战、会盟之事，都会派使臣前往联络。如何运用个人智慧完成君命，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。特别是弱国之使出往强国，如何

^① 《商君书·算地》。

维护国家利益,不丧权辱国,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考验。在这方面,《左传》一书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,使我们据此得以想见昔日使臣们的风采。再看游行,作者也说得明白,它“本生于道德仁义,泛爱容众,以文会友,和而不同,进德及时,乐行其道,以立功业于世”。也就是说,他是仁义贤达之士以道义相交,由以文会友达到以友辅仁的目的,而决非结党营私用逞私欲者可比。

然而,正如作者所言,到了周秦之末,情况改变了。春秋末、战国初,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,奴隶制度的迅速瓦解,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,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,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,他们礼贤下士,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,以至战国时期,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,一般的敢任善任不次提拔就更为常见。与此相伴随,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。本来,这种被称作“士”的人,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,接受过“六艺”(礼、乐、射、御、书、数)教育,平时为卿大夫家臣,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,“大抵皆有职之人”^①,待春秋末期,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变动,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,许多士再无田可食,也无原职守可奉,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可以一用的勇力。凭借着这种知识或勇力,他们或讲学授徒,或襄赞典

^① 顾炎武《日知录》卷七。

礼。当然,也有人投身政治,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轮奋斗。所以,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,他们是乐于为君用的。他们连同在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,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,并进而成为各国君主重要的依靠力量。与此密切相关,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,一些人或从师问学,以伺进机;或交友结党,用为援手,想方设法养大自己的名声,求取人主的垂顾,所以在游说者日众的同时,游行者也因此大大地增加了。

那么,何以在游说、游行者并出的同时,其作为个人的品节会被荀悦认为越来越低下糟糕呢?这与东周以降,奴隶制终结、礼乐崩坏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。在当时政治形势酿成的社会氛围中,上至人君、下至一般士人,人人怀自利之心,风俗人心不免日趋浇薄和衰败。清人顾炎武就春秋与战国时期风俗的不同,做过一番比较,就很能说明问题。他说:“春秋之时,犹尊礼重信,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;春秋时,犹宗周王,而七国则绝不言周矣;春秋时,犹重祭祀聘享,而七国则无其事矣;春秋时,犹论宗姓氏族,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;春秋时,犹宴会赋诗,而七国则不闻此矣;春秋时,犹有赴告策书,而七国则无有矣。邦无定交,士无定主,皆变化于此百三十三年之间。”^①这“邦无定交,士无定主”,可以说是前面诸项礼义缺失导致的结果。所谓“士无定主”,是说当日士

^① 顾炎武《日知录》,卷一三。

人的宗国观念淡薄，惯于附势趋利，哪里有利自己的发展就往哪里凑。由于他们撇开了先前礼义规范的束缚，一切言行皆根本于一己之私利，所以做出了许多为当时或后世正统士人所不齿的事来。荀悦在文中称游说“失之甚者，至于为诈给徒众”，游行“至于因事害私，为奸宄”，即据此而言。

游侠的产生，有着与上述两类人共同的历史背景。如果说，游说、游行是值社会大变动时代，旧贵族势力崩溃，中央与郡县行政机构尚未健全，社会等级及利益的重新划定尚未完成时，纷起并作，急欲凭才智谋取地位的话，那么，游侠同样是趁此百废待兴之机，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和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之时，乘隙而奋盛于一时的。故荀悦说：“凡此三游之作，生于季世，周秦之末尤甚焉。上不明下不正，制度不立，纲纪废弛，以毁誉为荣辱，不核其真；以爱憎为利害，不论其实；以喜怒为赏罚，不察其理。上下相冒，万事乖错，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，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。善恶谬于众声，功罪乱于王法。……是以君子犯礼，小人犯法，奔走驰骋，越职僭度，饰华废实，竞趋时利。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，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，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，割衣食之业以供飧宴之好，苞苴盈于门庭，聘问交于道路，书记繁于公文，私务众于官事。于是流俗成矣，而正道坏矣”，将游侠与前两者一律看做是末世风俗衰败的结果。尽管是站在正统的立场谴责“三游”，但在一个无序的社会里，有一群漠视成规，以自己的原则行事的

游侠产生，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

以后，苏轼由前及士的失职，分析何以到战国时游侠崛起，任侠之风弥散的原因，说得更为剀切：

夫智、勇、辩、力，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，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，皆役人以自养者也。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，与此四者共之，四者不失职，则民靖矣。……六国之君，虐用其民，不减始皇、二世，然当是时，百姓无一人叛者，以凡民之秀杰者，多以客养之，不失职也；其力耕以奉上，皆椎鲁无能为者，虽欲怨叛，而莫为之先，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。始皇初欲逐客，因李斯之言而止，既并天下，则以客为无用，于是任法而不任人，谓民可以恃法而治，谓吏不必才取，能守吾法而已。故堕名城，杀豪杰，民之秀异者，散而归田亩。向之食于四公子、吕不韦之徒者，皆安归哉？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？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！秦之乱，虽成于二世，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，有以处之，使不失职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。^①

推原苏轼的意思，他认为智勇辩力之士的失职，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，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。联系前述春秋奴隶制时代，封建全盛，井田未坏，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，百姓安于耕凿，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；及封建、井田制崩坏，诸侯大夫亡国败家之事接连发生，已无力顾及养士，有的则骄奢淫

^① 《游士失职之祸》，《东坡志林》卷五。

侈，根本无意恤士，终使士人“降在皂隶”、“于今为庶”，成为流离失职之人，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，纷纷覬为士者的实际情况，及以后王夫之所谓“秦灭王侯，奖货殖，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，富而豪者起而邀之，而侠逐横于天下”^①，他的论述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。在文中，他分士为智、勇、辩、力四类，智、辩即智能之士，善辩之士，属于偏尚用文一类；与之相对，勇力之士，则偏属用武的一类。结合荀悦所论“三游”看，毋庸置疑，这游说、游行之士出于前者，而游侠则出于后者，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。

因此，接着必须考察一下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，以便对游侠社会角色的定位，能真正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势。

应该说，古代所谓士，大都是武士。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，他们平居时为卿大夫家臣，统驭百姓，战时则执干戈，卫社稷，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。对此，今人顾颉刚从古代学校即军政训练之所的角度，作过专门论述。他认为古时设庠序学校以教，这庠、序、学、校四者，在当时皆是被人用来肄射习武的。“其所以习射于学宫，驰驱于郊野，表面固为礼节，为娱乐，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。”^②以后，杨宽通过论证西周大学为服从“国之大事，惟祀与戎”的训条，教学内容一“以礼乐和射御为主”；西周大学教师称“师”，

① 《读通鉴论》卷三。

② 《武士与文士之转换》，《责善半月刊》1卷7期，1940年。